

賴 文 李永宸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嶺南瘟疫史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

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

合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岭南瘟疫史/赖文 李永宸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12

(岭南文库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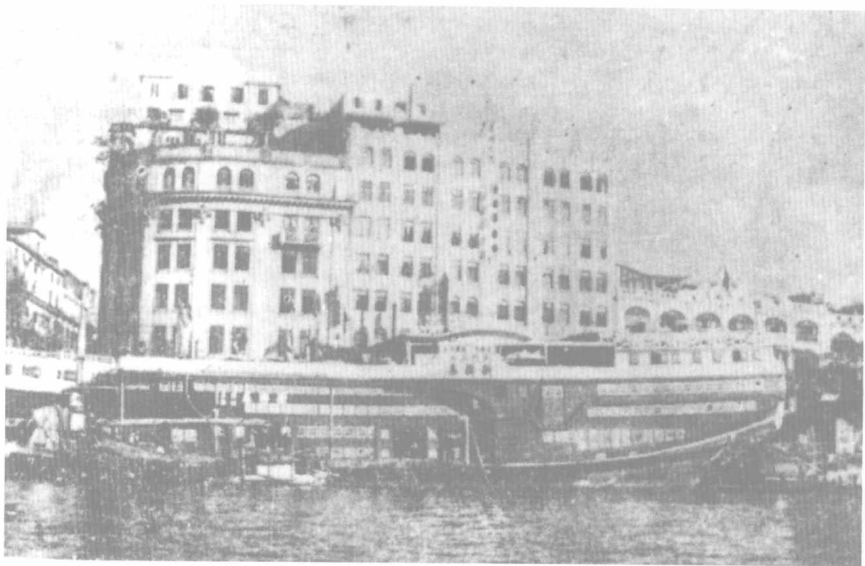
ISBN 7-218-04718-1

I. 岭… II. ①赖…②李… III. 瘟疫—历史—广东省
IV. R51-0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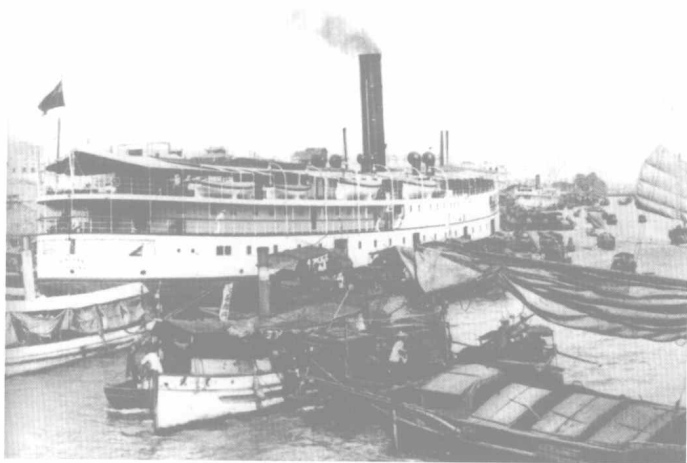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9411 号

责任编辑	柏 峰
封面设计	智 达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8
插 页	8
字 数	550 千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4718-1/R·155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早在1865年，轮船公司就每天有兩班輪船來往于香港和廣州之間。1890—1902年間，每年往來旅客約100萬；1903、1904兩年，分別達到140萬人和181萬人（見第五章第二節）。圖為珠江客運船——拖渡（引自《廣州舊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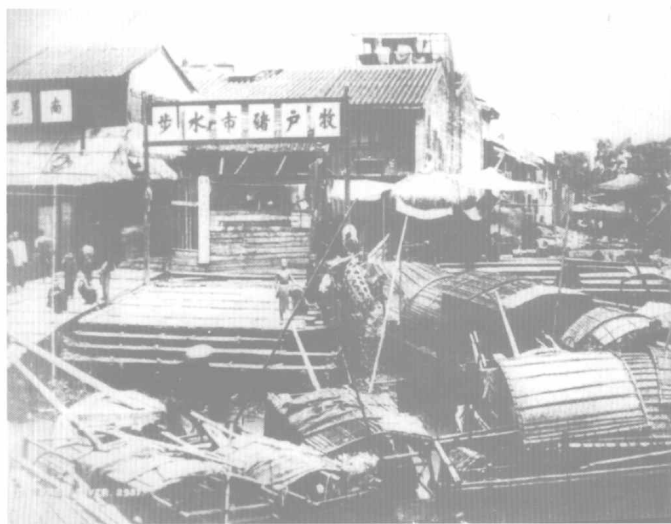


廣東與海外的頻繁往來，使廣東成為瘟疫的重要傳入地和播散地。僅1880年，廣州口岸就有直接去外國的輪船4艘、帆船3艘，共載移民2873人，全部去檀香山（見第五章第二節）。圖為停泊在廣州碼頭的“金山”輪（引自《廣州舊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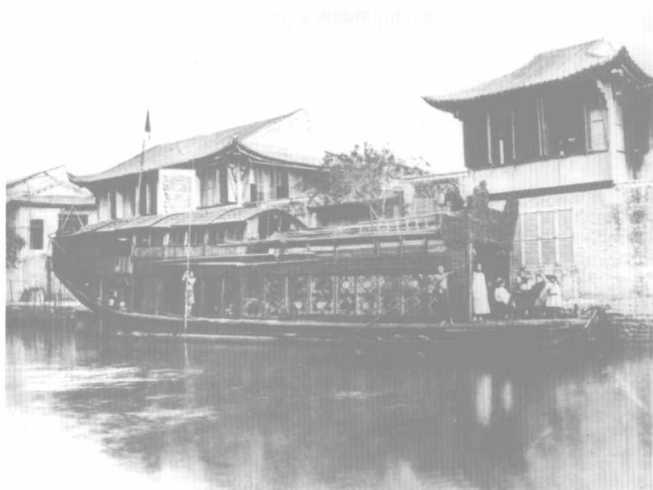
珠江三角洲和广东沿海口岸有相当数量的民船从事与香港的运输业务。据《1877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该年注册从事运输之民船总数达129艘（见第五章第二节）。图为广州一码头（引自《广州旧影》）。

珠江三角洲的民众用本地民船将他们的大部分土产运送到香港，并用本地民船将几乎所有的洋货直接从香港运入（见第五章第二节）。图为1890年广州的一个畜产专用码头（引自《广州旧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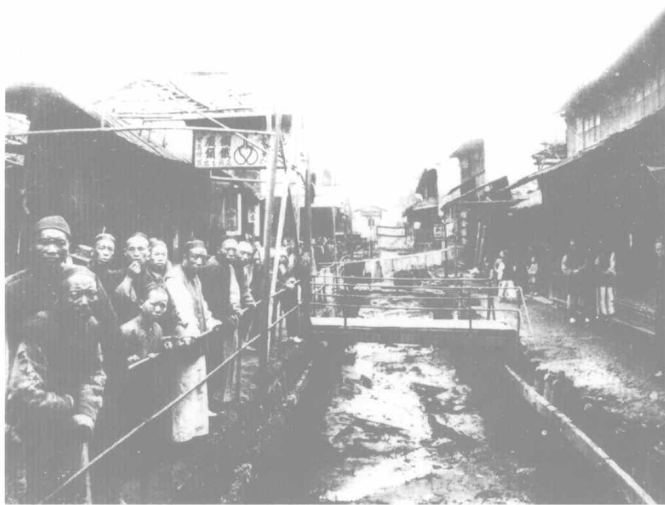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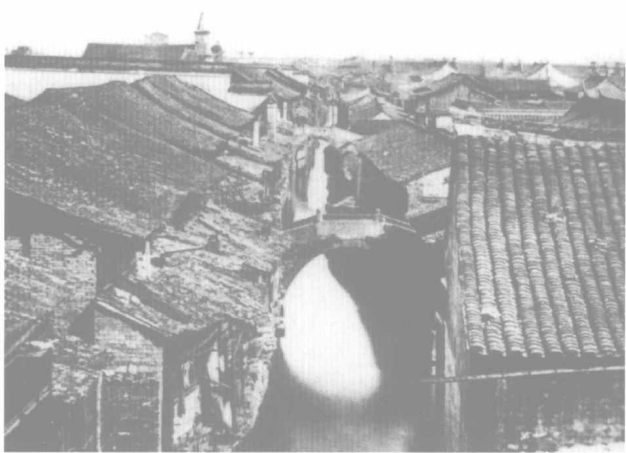
清中叶以后，城市发展很快，城市人口增长迅速。由于没有相应的卫生管理条例，民众普遍缺乏自觉的公共卫生观念，城市卫生状况很差（见第五章第二节）。图为清末民初时的广州鸟瞰图（引自《广州旧影》）。



1894年广州鼠疫流行时，妓院是传播场所之一。但在鼠疫流行高峰期的四、五月间，一些人还是照样狎妓作乐、下馆子上茶楼（见第七章第三节）。图为当时广州的花艇（引自《广州旧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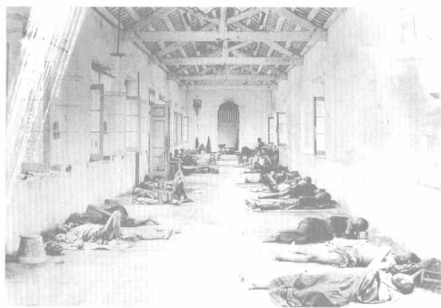
1894年广州鼠疫流行期间，疫情很可能是沿水路从旧城南胜里扩散的。西关地区河沟交错，地狭人稠，烟户栉比，秽气熏蒸，以至“传染几遍”（见第四章第四节）。图为当时广州西关街景（引自《广州旧影》）。



广州西关沿河涌搭建的稠密民居（引自《广州旧影》）。

明末清初广州一带已有纺织工场2500多家，1891年以后纺织业发展尤为迅速，这些织造业多集中在西关（见第四章第四节）。图为为纺织业提供原料的缫丝女工（引自《广州旧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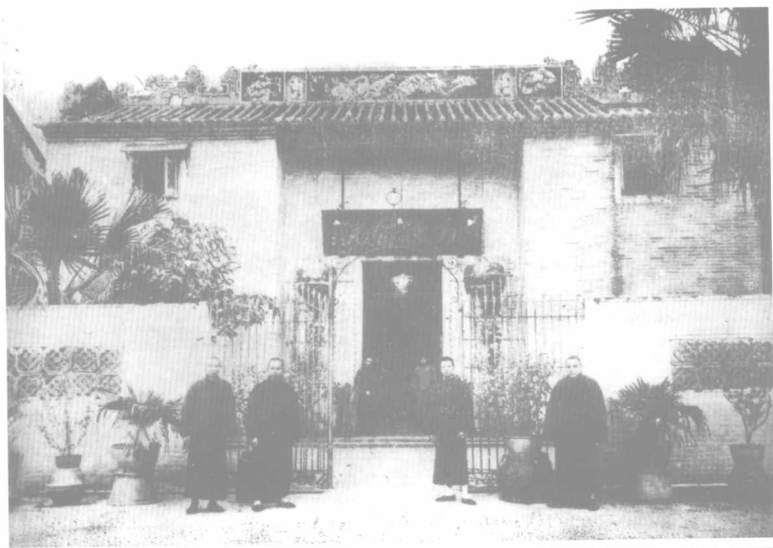
香港《治疫章程》第一款规定：“凡有患疫之人，无论轻重，须即迁徙医船或本局随时所定之专处限所就医”（见第六章第二节）。图为1894年香港政府指定收治鼠疫患者的临时隔离病院（香港历史博物馆藏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准予复制）。

图为当时香港普庆坊普仁街一带的清洁消毒现场（香港历史博物馆藏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准予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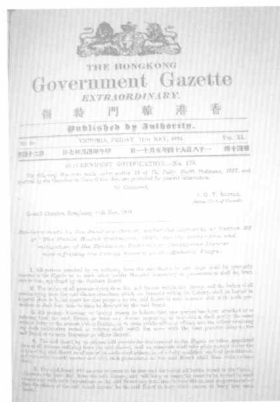


1894年鼠疫流行期间，香港洁净局查疫、消毒、拆迁等工作执行得十分严格。尤其是疫情严重的太平山一带，街道狭窄，人居密集，最是藏污纳垢之地，成为重点拆迁的地区（见第六章第二节）。图为当时英军清洁队在太平山居民区焚毁染疫民居的家私杂物（香港历史博物馆藏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准予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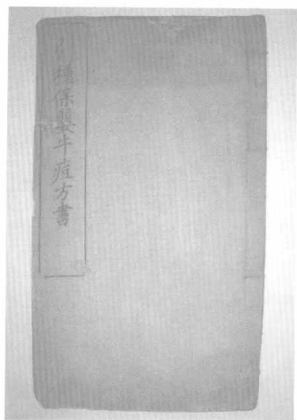
1894年，商人刘学询在西关黄沙四海通街独力倡办兼善堂救济鼠疫患者，留厂医治者不下数千人。1899年广州商会慈善人士在城西兴建方便所，免费收治危重病人和收敛街头死者（见第六章第一节）。图为1901年在方便所基础上改成的城西方便医院（引自《广州旧影》）。



1894年香港鼠疫疫情爆发后几天内，当局就迅速制定并批准实施《治疫章程》（见第六章第二节）。图为香港政府1894年5月11日颁布《治疫章程》的公告（据香港历史档案馆所藏缩微胶卷复印件拍摄）。



1894年5月8日凌晨，香港确诊第一例鼠疫病例；两天之后的5月10日，政府宣布香港为疫埠（见第六章第二节）。图为香港政府1894年5月10日关于香港爆发鼠疫流行的公告（据香港历史档案馆所藏缩微胶卷复印件拍摄）。



岭南人在防治天花方面最大的贡献，是率先学习和引进18世纪末西方发明的牛痘接种法，并向全国传播（见第九章）。图为邱熺（浩川）为推广牛痘法而编撰的《引种保婴牛痘方书》（书成于1817年）（摄于广东中山地方文献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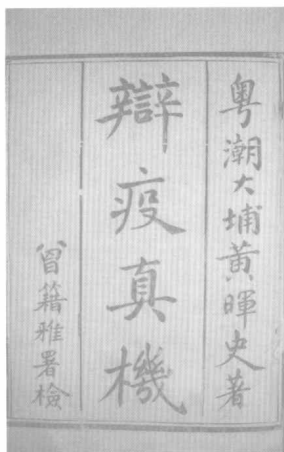
图为邱熺（浩川）《引种保婴牛痘方书》的插图（摄于广东中山地方文献馆）。



清末岭南受鼠疫之祸甚剧，在鼠疫防治方面做出的贡献也最大（见第九章）。图为广东吴川县吴宣崇草创、廉江县罗汝兰增修撰写的我国第一部鼠疫治疗专著《鼠疫汇编》（书成于1891年）（摄于广东中山地方文献馆）。



图为仕粤闽人林庆铨写的《时疫辨》（书成于1898年）（摄于广东中山地方文献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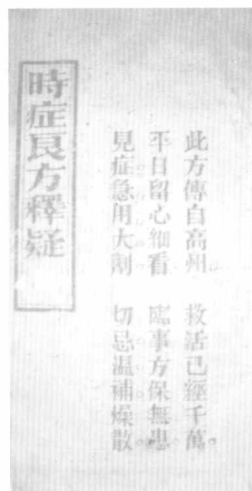


图为大埔黄炜元写的《辩疫真机》（书成于1898年）（摄于广东中山地方文献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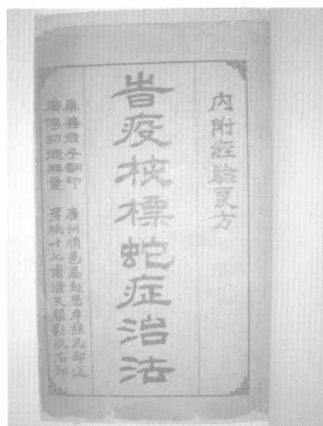
《时疫辨》所辑的南海劳守慎灸治流行性霍乱的“急救痾呕抽筋妙法”图（摄于广东中山地方文献馆）。



图为广州梁达樵写的《辨证求真》（书成于1905年）（摄于广东中山地方文献馆）。



图为高要黎佩兰写的《时症良方释疑》（书成于1901年）（摄于广东中山地方文献馆）。



图为李守中写的《时疫核标蛇症治法》（书成于1909年）（摄于广东中山地方文献馆）。

岭南文库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幼军	卢钟鹤	叶选平	任仲夷	刘斯奋
李兰芳	林 若	陈越平	杨资元	杨应彬
黄华华	黄 浩	萧如川	蔡东士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钟阳胜

主 编：朱小丹 岑 桑 (执行)

副主 编：陈海烈 (执行) 曾宪志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恩才	卢子辉	冯伯秋	朱小丹
庄 昭	刘扳盛	朱仲南	李权时
李达强	李锦全	岑 桑	辛朝毅
张 磊	陈俊年	陈海烈	金炳亮
洪志军	胡守为	饶芃子	梁 钊
梁渭雄	黄尚立	曾牧野	曾宪志
曾昭璇	廖晓勉	颜泽贤	

序

中国医学家在与瘟疫的斗争中，曾为人类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特别是他们在战胜外来瘟疫的侵袭，夺取胜利方面，往往在“是故至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病已成而后药之，不亦晚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臣闻圣王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病可已”等思想指导下，以及“以毒攻毒”等思想指导下，创造出有效的防治理论与技术，从而战胜瘟疫，其成就在人类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医学家探索瘟疫防治理论与技术的实践中，从纪元前到15世纪间，为预防与治疗瘟疫积累了丰富的认识与经验，其中虽有不少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诞的内容，但也不乏黄金般闪闪发亮的光点。例如晋葛洪（283—343年）在隐居岭南罗浮山炼丹著述时，在《肘后备急方》中首次记述了天花的发病与病症，指出其由国外传入我国的历史。他虽然尚未就烈性传染病——天花的防治提出有效的办法，但他在论述狂犬病的防治时指出：

“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强调了杀取狂犬脑，敷被咬者伤口，可以使之不发狂犬病。这一技术在晋、隋、唐著名医学家的著作中，仍然清楚可见，继续发挥着防治狂犬病的有效作用。1885年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首次从狂犬脑中提取狂犬病病毒，并经减毒而制成狂犬病疫苗。还是这位葛洪，不但比较确切地描述了恙虫的生活习性，他还结合岭南多发此病的区域性特点，更强调了运用恙虫屑外敷中毒伤处，或内服以防治恙虫病。20世纪初，美国 Ricketts 的实验证明恙虫病的病原体是立克次氏体，1945年制出了疫苗。不难看出，葛洪在岭南期间总结同行经验与自己实际观察，在传染病防治方面已经作出了多么伟大的贡献！

天花传入我国的1000多年间，从理论上讲，在我国应该引起远比西方更为猖獗的流行与更加大的杀伤力，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呢？我以为这与中国古代先进的医学理论与丰富的防治实践技术是分不开的。因为在有关医学文献中大量描述防治天花历史经验的资料，可以看出或多或少获得了有价值的尝试和比较有效的经验总结，对天花流行的控制与病人治疗均发挥了有效的作用。特别在预防天花方面的杰出成就，为人类预防传染病作出了杰出贡献，这就是人痘接种免疫技术的发明。远在唐代伟大医学家孙思邈（581—682年）的著作中，已明确记载运用接种脓汁或健康人血清的方法，防治疔病的复发，这一富有“以毒攻毒”免疫思想指导下的实践，确曾获得预防多发疔病的免疫效果。今天我们虽然还不知道该技术是否曾用于天花的预防，但我们根据医学

家们以及接种人痘的医学家追记，对唐宋前后，曾有应用白水牛虱、兔头煎汤浴等等预防天花屡试屡效的描述，甚至说“终身不出痘”等。必须特别指出：最为成功的是宋真宗（998—1022年）时，宰相王旦经荐邀请峨眉山神医，为儿子王素接种人痘，成功获得终身对天花的免疫效果。史料证实：王素的兄长均因天花而夭折，唯独他活到67岁，也从未感染过天花。到了明隆庆间（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医学家发展并推广了这一技术，“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痘者，宁国人居多”。明清时期接种人痘技术历经不断改进，不但十分安全，而且使成功率提高到97%。17世纪中，康熙皇帝为了皇室弟子不受天花之害，将人痘接种医师请到清官为皇室与大臣子弟接种人痘获得成功，康熙还要求将此技术向全国推广，他还特别将此成功经验写入《庭训格言》（1681年）“诸子女尔等，子女俱命种痘”，1688年“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种痘”。这一技术逐渐经由俄罗斯、土耳其、英国传至欧洲、非洲、美洲及亚洲各国，为人类控制天花的暴发性流行与大大减低死亡率作出了出色的贡献。直到1796年，英国人痘接种医师——琴那，始将人痘接种改进为牛痘接种，使之更安全、更有效，经过人类百余年的努力，世界卫生组织于1979年10月26日，在肯尼亚内罗毕正式宣布全球消灭天花。这一人类医学史上第一次彻底战胜一种烈性传染病的光辉成就，中国医学家的贡献是谁也不能抹杀的。更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是：我们的免疫思想开创了人类免疫技术的先河。

正是鉴于此，我历来十分强调疫病史之研究，在国内外期刊、学术会议上，也多次发表了自己的研究论文，在指导研究生学习中，也希望他们在此领域作些探讨。历史是一面镜子，我希望通过瘟疫史、疫病史研究，能够在当代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实践中有所借鉴。记得在5年前我赴广州领取因《中医大辞典》而获的“第二届中国广州仲景中医药杰出成果奖”之时，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古文教研室几位年轻教师到中央酒店访谈，征询我对他们开展古代瘟疫史研究的看法，记得当时我十分高兴地谈了自己的看法，除了一般地谈了自己的感受，指出该项研究的重要性和学术价值以及瘟疫史研究的科学意义，还说了一些瘟疫史研究由于资料缺乏、史料缺陷等引致的困难。不料他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过去调研基础上，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岭南古代疫病史研究》获得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研究二等奖。我祝贺他们在此少人问津的领域，默默无闻、艰苦耕耘、孜孜追求，在克服许许多多困难而取得了成功。在我的印象里，以为这一课题已经结题，因为他们的耕耘，不但已经获得了上述奖项，在国内重要期刊还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时间又过了3年，2003年12月我突然收到赖文教授、李永宸博士的来函，并随函寄来《岭南瘟疫史》书稿。由于业务工作繁忙，对书稿仅大致翻阅了一下，已经令我十分高兴。虽然未能细读体味，但洋洋五十万字的岭南一地的瘟疫史专著，实足为之欣慰。因为，这一专著不仅联系岭南的自然地理、社会环境，回顾了岭南1000余年的疫情，还结合实际讨论了岭南瘟疫流行的

诸种因素，并分别就天花、霍乱、鼠疫等作了深入细致的研讨。而且，他们对粤港防疫之差异、社会影响以及岭南医家的防治贡献，更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内容十分丰富，有着宝贵的借鉴价值。兴奋之余，不顾自己思想已较迟钝，用笔也感笨拙，信手写了这样一些文字。希望《岭南瘟疫史》之出版，能够唤起相关领导与学者进一步关注中国疫病史之研究，千万不要以为烈性传染病瘟疫已成历史，千万不要以为借鉴历史经验无足轻重。我们希望它已成历史，更希望无需借鉴古人经验，但我们必须重视历史经验与教训的系统总结，即使当代用不着，将此历史宝典束之高阁，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为子孙保留遗产的光荣传统。赖文教授、李永宸博士要我为《岭南瘟疫史》一书写序，以此感触代之，并表示衷心祝贺。

李经纬

2004年春节